

有历史的就有
传奇

走出历史的烟尘

李菁 著

我所知道的溥仪
袁克定的残烛之年
最后的格格
张伯驹：但使国宝永存吾土
海上闻人杜月笙
张学良在台湾的幽居岁月
打捞“太平轮”记忆
陈友仁与一个家族遗落的传奇
章士钊：93岁老人的最后一次斡旋之旅
还鲁迅一个真面目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014036052

K820.6
83

走出历史的烟尘

李菁 著



K820.6

83



北航

C1715626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出历史的烟尘 / 李菁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3. 12

(有历史就有传奇)

ISBN 978-7-5060-7102-4

I. ①走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名人-生平事迹-中国-民国 IV. ①K82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8589 号

走出历史的烟尘
(ZOUCHU LISHI DE YANCHEN)

作 者: 李 菁

产品经理: 刘晓立

责任编辑: 杨 颖 刘晓立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8 000 册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6.5

字 数: 236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102-4

定 价: 36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04

序

口述历史：当想象遭遇现实

文字里的人物，一步步走来、伸出手，说道：“我就是周海婴。”然后，彼此落座，讲述与倾听开始……嗯，我们会拥有一次奇妙的回忆与追寻，并得到一个新版本的故事吗？

想象落地。这是我重读李菁文章最直接的感受。

所谓采访，于记者，是有准备的一种职业行为。而之于被采访者，比如周海婴、周有光、黄永玉……著名久矣。文字以及影像制造出的他们，早是我们未谋面的熟人了。只是，当想象里的“熟人”走进现实，伸出手与你相握的那一瞬——想象遭遇现实之际，你将如何？

李菁的兴趣是历史的人物，她的基本操作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至亲或好友，进行深度的采访，然后以“口述”的方式来完成她的历史故事。

“口述”，你说我记，看起来是最容易的一种文章模式。果真？没那么容易。

当双方彼此坐下来，开始共同的追寻旅程，记者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对自己想象的克制与调整——如果采访是一个有智力含量，值得分解并被分析的职业行为，那么，这个技术动作，由准备开始。任何一个普通的采访都需要准备，遑论深度的访问；真问题不是准备，而是你精心准备之后，必然形成了对当事人想象。准备越充分，想象越完备，在一两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采访里，你的想象是否可能被坐在面前那个活生生的当事人改变？

当然，我们不知道那个当事人有无足够的能量来改变你的想象；只是，克制自己的想象，建立作为倾听者的零度情感状态，才是基本职业伦理。这不是拒绝对讲述者情感的关切，而是警惕来自自身想象的偏见。

那个老头黄永玉在讲述比他更老的老头时，所隐藏的情感强度，肉眼亦可洞穿；当他转身讲述自己时，情感会扭曲现实场吗？77岁的周海婴，穿越70年回忆童年时的自己与父亲鲁迅——这个更愿意称父亲为“鲁迅”，而不是“爸爸”的儿子与回忆者——他故事里的那个自己与父亲，是曾经童年的记忆

里的，还是经过70多年修正的结果呢？

所谓“口述”，这个时候你看到了它的挑战了吧！彼此面对面之际，作为倾听者与记录者的记者，在克服了自己的想象后，迅速地、无可逃避地要面对被采访者的自我想象。

在想象中穿行的这份职业，如何抵达事实的彼岸？

李菁所有卓越文章的起点，是她有罕见的对珍珠般细节的发现与辨识能力：“对我父亲（鲁迅）而言，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够的地方——比如她说看到父亲吸烟不是放在嘴里，而经常点着了放在那儿烧，既然烧，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；茶叶也一样，有时候她泡在那儿，他也没喝，这不浪费吗？”我们要知道，所有想象都是以一种概念或者标签打结，但在这种闪亮的细节面前，鲁迅许广平爱情婚姻的标签，将如秋叶般无声无息的坠落，生活的本来面目也因此而一览无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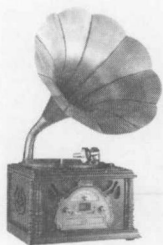
被采访者所有建构性的概念化的叙述，将被那些无法作为“证据”安放进逻辑里的小细节给自然瓦解，丰富的非概念性的人生与命运、“新版本”的故事由此诞生。只是，谁能发现这种种真实人生的细节？李菁能。

这种越越性的能力，使李菁在讲述与倾听开始之际，作为倾听者，有足够强大的气场，既穿越自己的想象与偏见，亦洞穿当事人抑恶扬善的自我标签化。这是一个优美无比的、让想象落地的过程。更多的阅读之后，复盘讨论李菁采访的这个技术动作，我们终能欣赏她的无可复制。

李菁何以如此？或许她对人生际遇尤其转折时候的好奇，更深刻的情怀来自于她对命运的悲悯——“忽见（张）伯驹先生蹒跚而来，孤寂索漠，坐于小偏桌旁。餐至，红菜汤一盆，面包果酱，小碟黄油二小块，先生缓慢从容，品味红菜汤毕，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，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，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……”这虽然是李菁转摘自黄永玉的描述，但她对细节的选择，却实在精当。“隐去”之时，命运固然苍凉；但隔着遥远的时空，这份苍凉被有心人重新择出，人生亦因此而温暖。

那些走出文字里的人物，经过李菁，想象落地，再次形成文字、形成这本书。它当然迥异于你曾经印象里的那些人物，而且不可替代。
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执行主编李鸿谷



目录

CONTENTS

序 口述历史：当想象遭遇现实 李鸿谷 1

第一章 蹉过历史的河流

- 我所知道的溥仪 口述人：毓 瞻 2
- 润麒：走出历史的烟尘 13
-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 口述人：张传綵 24
- 最后的格格 口述人：金默玉 36
- 海上闻人杜月笙 口述人：杜维善 50
- 张学良在台湾的幽居岁月 68

第二章 不该被遗忘的名字

- 打捞“太平轮”记忆 82
- 陈友仁与一个家族遗落的传奇 97
- 伍连德：不该被遗忘的名字 114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曹聚仁：浮出水面的“密使” | 137 |
| 章士钊：93岁老人的最后一次斡旋之旅 | 146 |
| “一代国医”吴阶平 | 151 |

第三章 是真名士自风流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张伯驹：但使国宝永存吾土 | 170 |
| 被遮蔽的邵洵美 | 口述人：邵绛红 182 |
| 还鲁迅一个真面目 | 口述人：周海婴 192 |
| 王芸生：一个人与一部书的传奇 | 202 |
| 唐德刚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| 208 |
| 周有光：笑看风云人未老 | 219 |
| 黄永玉：一蓑烟雨任平生 | 237 |

第一章

蹉过历史的河流





我所知道的溥仪

口述人：毓蟾

采访时间：2006年

除了听力稍差些外，反应敏捷、语速极快的毓蟾丝毫不像一位82岁的老人。曾采访过毓蟾的一位英国作家描述他“精力充沛、温和而又幽默”，“体现出了这个皇族勇于承受的精神，对于失去的地位、财产、封号，毫无怨言，为还能活下来而感恩”。曾经的显赫家世、与末代皇帝相伴20年的特殊经历，特别是作为战犯的十年囹圄，而今都变成一种历经沧桑后的豁达与淡定。

我的身世

我和溥仪都是道光皇帝的后代，道光皇帝有7个儿子，继承皇位的咸丰是皇四子，被封为恭亲王的奕訢（也就是我的曾祖父）是皇六子，皇七子醇亲王就是溥仪的祖父。所以从辈分讲，我是溥仪的下一代，我们是叔侄关系。

我1923年出生在大连。我们家怎么从北京“流落”到大连？这还有一个故事。当年咸丰赐给“恭亲王”奕訢一柄白虹刀，这把刀有点像现在常说的“尚方宝剑”，可以先斩后奏。有人说这把刀曾杀过明末抗清

名将史可法，不过我至今还没找到证据。白虹刀后来传到父亲溥伟手中。光绪临死前，让摄政王载沣杀掉袁世凯。父亲说：“我可以用这把白虹刀杀袁世凯。”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，清朝内部一时犹豫，袁世凯没有被杀成，反而做了大总统。父亲怕袁世凯报复，就跑到德国的租界地青岛了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青岛又被日本占了，但在1922年还给了民国，既反对共和、又想复辟的父亲只好搬到了大连。

我记得小时候，这把刀就在大连的家中收藏着。我们家就住在海边，可能是潮气太大，刀上长满了锈。这和清末时期乾清门的侍卫带的刀差不多，锈得拔不出来。后来找到常在我们家门口转的一个磨刀的老白俄——他用一个木头架子，安上一个大轮子，下边有个踏板，类似缝纫机，一踩起来带着砂轮转，把锈磨掉后，白虹刀还亮了许多。

父亲到大连后，住在日本东拓（东洋拓植株式会社）给盖的房子里，在大连黑石礁附近，一座很大的洋房。1936年父亲去世后，连地带房都没钱还，房子后来就被“东拓”收走了。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回大连时，那幢房子还在；90年代第二次去，房子已被拆了。后来大连市政府听说我父亲住过，还特地去找过那幢房子，他们找到了附近最好的一幢，以为是我们家的。我去了一看，说这是金璧东的房子，金璧东是金璧辉——也就是川岛芳子的哥哥，我们家比他们家的房子破。

我们在大连生活时，“满洲国”一年给父亲一万块钱的生活费，几乎等于平均一个月800多块大洋，生活肯定比普通人家过得充裕一些。但父亲以前是住在恭王府里的人，到了大连，还摆出王府的架子——很大的一个楼，这么一大口家，还有佣人、厨子、司机，父亲每月花几百块钱聘一个秘书帮他处理事情，家里的开支太大。当时相信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的父亲还专门从北京请了一位老夫子，教我们兄弟三人念书。父亲一去世，家里马上拮据起来，靠变卖东西生活。

当然，说起来北京的“恭王府”曾经是我们家的。后来有人问我，对恭王府“你家”有什么印象？我能有什么印象？！1957年我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放出来，人家溥仪是特赦回北京，到哪儿都有安排。我们放出

来时，人家只给20块钱，问一句：“家在哪儿？”回答：“北京。”我们接过一张回北京的票就来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进北京，住在什刹海附近的南关房，离恭王府非常近。那时候看恭王府，觉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吃饭还没着落呢！恭王府里面是怎么回事，我父亲、我祖父在里面怎么生活……我压根想都没想。

与溥仪在长春

父亲是1936年去世的。依然按照前清王室规定，我带着三件传家宝——咸丰皇帝的密谕、大阅御用的紫宝石黄丝腰带和那把白虹刀，前往长春，追随溥仪。其实我到长春溥仪那儿念书，也是为了带出一张嘴，给家里减轻点负担。我到了长春后，溥仪将我母亲和两个弟弟也接过去了，每个月还给一定的生活费。

溥仪在长春办了个私塾，还是抱着复兴大清国的梦想，他想先培养出心腹，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，毕业回来之后，到伪满军队里当官，这样伪满军队就成了他的嫡系。1937年我到长春时，私塾里有五个学生。除了汉语、数理化、历史课等，我来的第二年赶上开英语课，老师陈承翰是溥仪二妹夫的舅舅，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。我们都是从ABCD开始学的，读的课本叫《New Crown》。学了两年，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了，溥仪怕日本人说他亲美，就不让我们学英语了。

私塾里有一堂特殊的课是溥仪亲自上的，专讲雍正的上谕，因为溥仪最崇拜雍正皇帝，反对结党营私。溥仪本人就有些“谈党色变”，当时伪执政时期日本人就要成立“协和党”，溥仪就害怕听见“党”字，坚决反对，所以日本人把它改为“协和会”，虽然是换汤不换药，但溥仪就同意了。

溥仪也是个“三分钟热情”的人，那时他新买了打字机、油印机，想图个新鲜。他不会打字，官府内的打字员正好是我们的远亲，溥仪就把他叫到自己居住的缉熙楼上来看着他打字；溥仪用打字蜡纸在玻璃板上用复写笔抄雍正上谕，再油印出来。溥仪也没长性，没讲几课，他就停

了。

溥仪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雍正的《朋党论》。学《朋党论》不能白学，要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绝不结党营私。怎么表示呢？就要人人互相监视，对其他人的一言一行随时要向溥仪打小报告。我们几个学生其实都是同族宗亲，但到最后都变成了非公事不言，都怕被打小报告；而我们这些学生，要对他无限忠诚，绝对不许说假话。后来有的学生年岁大了，结了婚，溥仪高兴了会问一句：“昨天回家和你媳妇……”学生也得如实回禀，不然就犯了欺君之罪。

溥仪的疑心重。当时有很多传闻，比如汪精卫到日本治病后死在那里，吴佩孚也在日本治死了，溥仪听了，总是害怕日本人安窃听器或是害他。他那段时间比较苦闷烦躁，经常打我们出气。溥仪有一次得了痔疮，买了不少药，我那时还小，看到这种药很稀奇，随口说了句：“这药很像个枪弹！”这立即触动了溥仪的忌讳：“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？”于是我狠狠挨了一顿板子。溥仪那时候没有生杀大权，我相信，如果有，他肯定会把我拉出去毙了。皇上杀个人算什么呀？

在溥仪身边“不胜小心”——他喜怒无常，你真的是没法小心。有一次溥仪有点感冒，发了点烧，要避风。你在他身边看报，翻过来看另外一版，就这点风也能让他“龙颜大怒”：“你不知道我在避风吗？用报纸在我身边扇风，是不想让我快点好吧？”于是你便要赶紧趴在地上请罪、磕头。

还有一次溥仪突然使劲盯着我，把我看得直发毛，我就避开了他的眼光，谁知麻烦还是来了。“你怎么不敢看我？一定是心中有鬼，一定是和我有二心了吧？”这帽子一下子扣上了，解释也没用。我只好还是磕头，再自扇耳光，痛哭流涕：“奴才死也不能离开皇上啊！”这样才逃过一场灾难。

以前我们对溥仪一概叫“皇上”，直到改造后才改口叫“大叔”。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提到了数百人，都用的真名实姓，但唯独我们三个“毓”字辈的，他都给化了名，我在这本书里就是那个“小固”。

至于为什么把我们“三小”用了化名，我还从来没有问过他。

“溥仪不是同性恋”

1937年初我到长春时，有一次溥仪在西花园东屋里举行家宴，他的弟、妹、妹夫们还有我们几个学生都参加了。我在这次家宴上第一次见到了“皇后”婉容：她特别瘦，脸上化了妆，烫了发，穿件绿色丝绒的旗袍，旗袍的面料特软。

那天吃的是西餐，我们只顾低头吃，也不敢乱看。溥仪向婉容介绍了我，说“这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”——如果论辈分，我和婉容的外祖父毓朗是一辈。那时候婉容还可以出来参加宴会，溥仪的妹妹们有时也到她那边去。

那时溥仪住的缉熙楼是一幢两边对称的二层建筑，西半部是“帝居”，东半部是“后居”，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势头。婉容的饮食起居由几个女佣人伺候着，还有一个太监，也是个大烟鬼，他们住在东厢房。有时偶尔靠近了东半部，就能闻见由门缝里飘出来的鸦片烟味，混杂了屋子里的各种怪味，实在是熏死人！

我第二次见婉容是在几年后的一天，我正随溥仪上缉熙楼，刚上了一半，溥仪忽然朝对面一指，我一看，婉容正站在那边，蓬散着头发，穿着一件土黄色的睡袍，骨瘦如柴，满脸是鸦片烟灰的颜色，样子很是吓人。我不敢多看，也不知溥仪作何感想。

在伪满洲国最后一周的日子里，苏联的飞机天天晚上飞到长春空袭。每一次空袭警报后，溥仪就带着后来的“贵人”李玉琴钻进防空洞，却从来没有叫过“皇后”婉容，看来在他眼里早就没有这个妻子了。

我想对于婉容的不幸，溥仪也有责任。关于溥仪，后来有很多传言，但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溥仪不是同性恋。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他身体上的原因，其实写两个英文字母“ED”¹就明白了。

1 ED: 勃起功能障碍 (Erectile dysfunction) 的简称。



婉容

在我去长春之前，曾听父亲讲过，有一年他去长春祝贺溥仪生日时，正好遇到溥仪生父——醇亲王载沣，还有其他从北京来的清廷遗老遗少们。他们当然谈到了皇嗣问题。清宫自同治皇帝以后就再没生过皇子，那时候溥仪也正是壮年，这些遗老遗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“今上”了。那时大家都认为不生孩子的过错在女人，所以想让溥仪的父亲出面劝溥仪再娶一房。据我父亲说，王爷听了大家的请求之后，又摇头又摆手。“知子莫若父”，当时我父亲哪里知道溥仪的难言之隐呢！

溥仪后来在长春又找了谭玉龄。谭玉龄在北京不过是个中学生，十七八岁，但我看见她时，她烫着头发，穿着丝袜、高跟鞋，以及很讲究的旗袍，完全是一副少奶奶的模样。吃饭时，我们陪着溥仪，而谭玉龄由溥仪的妹妹们陪着，男女不同席。

溥仪在回忆录里说谭玉龄的死，“对我至今还是个谜”。我倒觉得，谭玉龄究竟得的什么病才是个谜。很多人说谭玉龄的死是日本人害死的，我如果说谭玉龄不是被日本人所害，也没有证据，但我可以这样说：如果谭玉龄不找日本医生治病，她当时的病情十有八九也要死。

谭玉龄死后，吉冈安直一直张罗着给溥仪找日本女人。我那时在溥仪寝宫的桌子上看到过一些女学生们的相片，都贴在一份“体检表”上，大概有20多份，但我也不敢正视，只能偷偷瞥一眼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在原本为“皇后”设计的“同德殿”的二层，本来是空着地方忽然摆上了一张双人床。有一天我从缉熙楼后门出来，见到一个穿着中式花衣的女孩子正在接受消毒——就是往身上和脚底下喷石碳酸液，然后就去了同德殿。晚饭时，一个女佣向溥仪汇报“奴才小姐”今天如何如何。过了没多久，女佣汇报时，突然改口“奴才贵人”，我们明白，李玉琴已经被封为贵人了。

溥仪纳了新贵人，也没见他的生活有何变化，我好像也从来没见过他在李玉琴的同德殿留宿，而且也没有和李玉琴一起吃过饭。溥仪高兴的时候，偶尔也讲讲李玉琴，说她现在也学会消毒了，比如有个苍蝇落在手上，她马上就用酒精棉球擦擦。这当然是溥仪“言传身教”的结果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，对李玉琴提的很少，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离婚的事也都删掉了。李玉琴后来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过溥仪两三次，最后一次是下定决心离婚而来的，管理所特别破例留她在管理所住一宿，想帮溥仪做最后的努力。但恰恰相反，留宿的结果似乎更促成了李玉琴离婚的决心。从她1943年进了伪皇宫到1945年8月两年多的时间，我只见他们分楼而居，不知是否曾真的同床共枕。也许在战



1959年12月，溥仪在战犯管理所中劳动改造的情形

犯管理所的这一次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

我再见到李玉琴是20年后的事了。溥仪被特赦回北京后，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委员会委员。有一次已在长春图书馆工作的李玉琴来北

京，想见溥仪。溥仪那时还没有结婚，李玉琴早就又结了婚，孩子也大了，单独见面不太合适，就把我和毓岳找来作陪。

那时候溥仪住在全国政协的宿舍里，我们陪着李玉琴去了。几人寒暄几句后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我和李玉琴坐在沙发上随便翻看画报，我突然想：这要在20年前，溥仪不把我打个半死才怪呢。

“末代皇帝”的最后

从1937年到长春，一直到1957年1月离开战犯管理所，我和溥仪在一起整整20年，其中付出“十年铁窗”的代价，我这一辈子，算是为溥仪牺牲了。

从抚顺回到北京，大家和溥仪见面，但叔侄关系平平。1961年初，溥仪到了全国政协，我那时在大兴一农场劳动，每个月公休四天，进城回家，有时就去政协找溥仪。那时也没有电话事先联系，好在他和我一样都是独身，倒也容易见面。

大概是1961年年底，我有一次到政协去看溥仪，他正好要穿大衣外出。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去哪儿。他的街坊赵大爷也在屋里，对我说：“这人啊，要是一搞上对象，就和往常大不一样啦！你看，这么大冷的天，一早就往外跑。”我一下子明白怎么回事，赶紧告辞出来。后来听说溥仪和李淑贤结了婚，不过他也没邀请我。

1963年，我结了婚。本来我不想告诉任何人，但母亲还是告诉了溥仪。后来溥仪和李淑贤夫妇到我家贺喜，我也没见着。溥仪送了我一个铁皮暖瓶，上面印了一个古代美人，这在当时已算很讲究的了，因为一般的都是竹子套的。

后来一个朋友到我家看到这个暖瓶，告诉我这是溥仪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，但他嫌古代美人属于“四旧”，不太好，一直没用，又送给了我。看来溥仪的脑筋真是够“新潮”的！但我也没几个钱，“四旧”就“四旧”吧，裁了个红纸条写上“破旧立新”四个大字，贴到大美人身上，接着用。